新史學二十三卷四期
二〇一二年十二月

亞洲地域史研究與地緣政治論再考

濱下武志*

序言——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兩極分化

二十一世紀跨越了從來視為現代世界特徵的「國家與國際關係」時代，一方面朝著「全球化」的方向急速前進，一方面卻也同時出現朝另一個極端「地方化」前進的動向。這種兩極分化將居於其中的「國家」定位為另一種歷史性的地域空間，也提示歷史研究有必要檢討「國家」的角色如何在歷史上形成。數世紀以來，無論是重層且多元發展的歷史主體，抑或複雜而多層次的歷史空間，都侷限於單一民族或國家，因而使國家成為歷史發展的唯一主體。本文所謂的「地域性」(regional)，乃是一種從現代回顧歷史的觀點，重新檢討這段所謂「國家時代」的歷史時期。換言之，「地域性」的視點同時也透過歷史長時段的地域變動，試圖尋找出相應於現代世界全球與地方兩極分化的分析架構、理念結構與歷史研究框架。為此，便有必要

* 廣州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院長。
本文譯者李侑儒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。

系統性地檢討地域這個多樣而多層次的空間；而能夠將全球化與地方化兩者納入研究視野，並重新檢討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甚至文化空間的二十一世紀「地緣政治論」(以下簡稱為「地政論」)也相應而生。

一、地政論與地域研究

就一般概念而言，所謂「地政」(即「地緣政治」)者，可以定義為與地域統治相關的各種方策內容及其實踐。無庸置疑，地域統治的討論雖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政策面向；但也由於地域乃是統治的對象，故除了重視地理空間的政治層面之外，亦包含經濟、文化及軍事等層面。然而，此處所謂的地理空間並非單指自然地理，其所重視的政治地理，更是以自然地理為前提，並與人類社會諸集團相互聯結而成的地域空間。

另一方面，相異於地政論，政治地理將視點置於地域空間，以地理關係來處理國家等各種政治主體的利害關係；但若單就以地域為「研究主體」這點而言，兩者卻也有所共通。然而在歷史上，地政學也時常出現在支撐國家或民族向心力的極端議論中，特別是偏向政治及軍事的議論；而在針對這類極端議論進行反省時，政治地理學也主動在理念與目標上與地政論有所區隔。無論是政治地理學與地政論之間的重疊與分歧，乃至於分析現代世界時所運用的世界體系論，自然也是地政論的一種延伸。

在地政論中，所謂「經濟」並非意指 homo economica 概念的「經濟」，而是「經世濟民」的社會經濟政策；「文化」亦非 culture，而是「文治教化」意義上的文化政策，兩者皆與廣義的統治策略有所關聯，不侷限於政治。因此，歷史研究中的地政論史研究，也不該再將「軍事」、「政治」狹隘地理解為基於國家利害關係而行使的方策。

地政論史研究不但要考察統治政策的主體，還應該透過更高層次的地域秩序或內外地域關係的視點，檢討作為統治政策的前提，甚至是對其造成影響的地域空間，以及海域空間的歷史構造與變動。

此外，國家領域的對象、國家的地理位置、國家領土內的自然資源、氣候條件、人口、民族等屬性，都是地政論所欲探討的重要議題。一個國家的地理因素，有各式各樣對其國家存續發揮影響的方法。地政論不僅重視位置、地形、地勢、氣候，也認為各國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要素對國家的政治影響力較為間接，藉此強調地緣政治的開放性，或對外關係的重要性。

二、西歐與非西歐的地域秩序

在十七至十九世紀，近代西歐國際關係理念的前提，奠基於各國相互承認「在國家主權之下，一切皆為對等」。因此，個別追求國家利益的情況，終於引發了各國之間對國家利益的相互競爭；而之所以如此，則源自於「世界全體將因競爭而發展」的概念。換言之，實際存在的領域大小、資源多寡、生產力強弱等因素，都由於「主權的對等性」而為之顛覆。透過地政視野所見的非對等性，歷史上實際上則基於「大國」的持續擴張，終將出現企圖「調和」之舉。西歐各國揭櫫「國家建設」與「近代式發展」的目標，而對於非西歐世界，則是一段基於民族主義而被迫追求乃至容許國家建設的歷史。西歐地域世界中「地域統合」的概念，也因此被視為全世界共通的理念。

另一方面，在非西歐世界中，各國基本上根據「西歐即世界」的理念推行近代國家建設，並將過往的歷史置換為「先進與後進」的關係，期盼藉由追求進步而躋身近代世界(西歐式世界)的成員之一。為此，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一元論的近代化模型，便成為各國所追尋的

目標。不可否認的是，透過與西歐世界之間的比較而形成的自我認識，未必與基於該地域的「歷史地政」所產生的地域認識相同。

三、亞洲地政論 (亞洲地域秩序論)

非西歐世界的地政究竟如何？即便此一研究課題尚未清楚辨明，但在亞洲，卻似乎可見透過地政取徑進行自我認知、甚或自我主張的情形日益增加。表現為地緣政治的地政論，試圖藉由歷史上的中心與周邊、南北地域等，說明其與周邊諸國及諸地域之間的利害關係；而更進一步從國家觀點討論其與海洋之間的歷史連繫，則又是另外一項特徵。即便歷史上國家與海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，至今卻依然未受充分重視。相異於傳統「一點四方」(由中心點朝東西南北四方呈放射狀擴張其影響力)的中心主義，地政論則企圖討論單一地域體系的理論架構。地緣政治本來就不只將國家視為唯一的對象。歷史上雖然也曾出現為調整地域間均衡或利害關係的地域論，在二十世紀前半，由於國家或民族等具有排他性向心力的主題參入，反而導致地域國家化，並以超越國家的形式發揮力量。地政論與地域研究的課題同時包含「相關且相對地定位國家之間的關係」，而在方法論上有所交集，同時也提示歷史研究中地域研究的可能性與問題性。

特別是，隨著現代世界朝向全球化的方向前進，環境、氣候、金融等超越國家規模分析架構的問題也大量出現。當討論全球化議題時，國家已是個過小的單位。然而與此同時，地方的地域性、地方的地域世界也再次登場。即便依然維持從前地方屬於國家的一部分、國家位居高位的上下關係，但現在地方上也開始主張地域的獨立性格，或是從國家分離出來的獨特社會文化特色；而創作並書寫地方史、討論如何形塑新的地方「世界圖像」(Weltbild)，乃是近年逐

漸興起的運動。對於持續掌握這些狀況，並從中尋找其關聯性來說，國家卻又是個過大的單位。換言之，隨著全球化「地方」的出現，研究者應透過全球規模的宏觀視野，思索跨地域的構想，與融合邊緣或地方視點的地域實像。為此，「網絡」這個能夠兼容並蓄且加以概念化的方法，在地域分析上也具備其效力。

四、小結—— 地政論與宗主型地域經營

近年由東亞所發起的國際秩序論展望，以及非西歐型國際秩序論等議題，現已逐漸受到討論；但這些問題若脫離歷史上的地緣政治論，恐怕終究無法成立。這些課題亦即：檢討在亞洲歷史上共時(synchronique)存在的多元地域主體、重層地域主權、廣狹義的民族主體，抑或多元民族主權的理想型態；整體理解非歐洲地域中歷時(diachronique)存在的宗主型地政論，並試圖與現代尋求連結。此外，西歐本身(即奠基於主權國家間相互關係而成立的國際體制)的背景，實際上也存在著王權或教會等「宗主型地政」共時且歷時性的強烈作用影響。反過來說，國家主權的意義所在，乃是為了對這些作用進行強烈的抵抗及批判，而國家的出現恐怕也未必是歷史發展或近代化的必然結果，只不過是由西歐地政環境內部首先創生而已。

以往尊奉西歐為模範，推行國家建設與近代化的非西歐世界，應藉由對應於各地地域史上錯綜複雜的複合地域統治，與多元地域經營的地政論，從當下開始努力反省所謂的「近代」。筆者以為，今後歷史研究應將地政論的中心設定為地域，而非國家；並以地域內在與外在的均衡與變動、地域間關係的平衡與動態、長時段視野下的地方・地域・世界三層次為基礎，闡明地域中多元而重層的實態。